



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 刘 钊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包含10篇论文、169段札记和2个计划草案，共计181个部分。他在书中首次系统论述了自然界的辩证法，推动了自然观的深刻变革；深入探讨了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推动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知论、方法论和辩证逻辑等理论工具。《自然辩证法》不仅是对自然界变化规律的哲学反思，更是对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刻阐释。学习这篇文献，对更深刻地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受到自然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深刻影响。19世纪是欧洲工业革命的高峰期，生产力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这一过程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生态破坏。工人阶级生活困苦、劳动条件恶劣、贫富差距拉大，同时工业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愈发严重。这引发了恩格斯对传统自然观的反思，尤其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他意识到，仅仅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是不够的，还需要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的层面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恩格斯希望通过《自然辩证法》揭示自然界的辩证法则，并将其与社会发展的规律结合起来，对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种种矛盾作出更全面的解释。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无生命的物体还是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既有斗争，也有合作”。人类并不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他提出，人类并不是自然界的主人，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界并非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整体；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都是通过辩证的矛盾运动实现的。这些观点打破了长久以来“人类主

宰自然”的传统观念，揭示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辩证统一，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对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作出更深层次阐释。“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自然是包含山水林田湖草沙的有机整体，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人与自然一起组成更有生机的“生命共同体”。用生命共同体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充分肯定了自然的生命价值，蕴含着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体现了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坚持人与自然是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逻辑必然。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责任，更是避免走破坏环境、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旧路的关键所在。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处理好生产与生态的关系。《自然辩证法》提出的自然界平衡与和谐的原则，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引。

经济发展必须以自然为基础

《自然辩证法》揭示的自然界内在的辩证关系，同样适用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一方面，人类生产生活依赖于自然提供的资源与环境，当自然的规律被人的主体性实践活动所认识与掌握，自然就成为“自然的历史”。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又不能脱离自然的规律，特别是生产方式变革遵循自然的规则，即历史成为“历史的自然”。只有“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相统一，人的主体性才得以形成和确立。恩格斯告诫我们，必须理解自然的复杂性、变化性和不可忽视

的反作用。自然界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人类的生产生活应当与自然界的动态平衡相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应当建立在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和尊重之上，任何忽视自然规律的经济模式都会付出沉重代价。工业革命以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自然系统平衡的做法，已经带来了资源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破坏等严重问题。20世纪西方国家的“八大公害事件”更加证明了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模式发展的局限性。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同样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我国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长期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资源过度消耗的问题。因此，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摒弃传统工业化模式，从新的高度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尽管《自然辩证法》中没有直接提及“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贯穿其中的思想无疑是对生态文明的早期探索。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等，与恩格斯提出的经济发展必须以自然为基础的观点高度契合，是对《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统筹科技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自然辩证法》不仅讨论了自然界的物质运动规律，还深刻揭示了自然、人类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指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自从“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

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科学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人类感知和掌握自然过程中产生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人类逐渐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能够深度挖掘地球资源、改造环境，甚至能用基因编辑、生物工程等技术影响生命本身。但恩格斯提醒我们，科学技术发展不是对自然的简单征服，拥有科学技术的人类也不是自然的自由征服者。如果不正确使用，科学技术也可能成为破坏自然的“利器”，甚至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恩格斯的警示在当前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技术只有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与对自然的深刻理解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为人类社会长远发展服务。

新时代以来，我国积极探索科技与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比如，清洁能源、智能电网和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都体现了科技进步与生态保护的双重目标。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离不开对科学技术的正确引导。一方面，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充分考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避免了为短期利益而牺牲长远的生态平衡。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应当以造福全人类为目标，推动绿色技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减少人类生产生活对自然的破坏。

实现人与自然、科技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人类文明迈向更高阶段的必由之路。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只有尊重自然规律，统筹科技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让高品质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繁荣。



西藏人民的千年跨越

——读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西藏的变迁》

□ 张德明

著名国际记者、作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华活动多年，写有诸多记录中国发展的书籍。他曾于1955年、1965年和1976年三次赴西藏进行实地调查采访，根据其亲身见闻于1983年出版了《西藏的变迁》英文版，2015年又推出中文翻译版。该书记录了西藏和平解放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西藏取得的重要发展成就。

不可逆转的变革来到“世界屋脊”之上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是当代西藏发展史上的两件大事。关于这两件大事的意义，爱泼斯坦写道：“西藏从帝国主义和农奴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成果之一就是西藏人向前跨越了一千年。经过封建统治的漫长黑夜后，他们和中国其他民族一起，开始迈向复兴和进步的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个成果则是西藏在一个世纪后，不再是外国势力渗透、阴谋勾结和冲突频发的区域。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有利于国际合作与和平。”

对于西藏人民而言，这两件大事带来了身心两方面的巨大解放，爱泼斯坦看到了这种变化，他指出：“渐渐地，他们从曾经主宰过他们身体和心灵的封建神权统治者手中夺回土地和牛羊，从乡村到地区建立起代表自己利益和愿望的地方国家权力机构，一场不可逆转的变革来到‘世界屋脊’之上。”

随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爱泼斯坦认为这标志着西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

“他们称解放军为菩萨兵”

爱泼斯坦在三次采访过程中，深入了西藏的家庭、学校、医院、牧场、工地，访谈了西藏当地各行各业的民众近千人，并对解放军、藏民、僧侣等社会群体都有生动刻画。对于在西藏的解放军，爱泼斯坦赞扬了他们的高度纪律性。他写道：“部队不但没有从藏族同胞那里白拿过任何东西，而且还努力避免造成任何不便，对于可能产生的任何负担都自己承担。甚至肚子饿了，部队也会尊重当地的饮食忌讳，不捕鱼，不捕猎。如果买卖东西影响了市场或者造成市场供应的短缺，他们就不去市场上采购，而常常靠吃野菜或田鼠肉充饥。”

爱泼斯坦还看到了西藏民众对解放军的信任与支持，他指出：“西藏劳动人民一直在比较解放军和他们以前见过的军队，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实际行动，认识到解放军是一支新型武装部队，和他们有同样的阶级感情，是在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尽心尽力。因此，解放军需要任何帮助总能得到群众的迅速回应，而且还往往是群众主动提出的。”他还提及，西藏的农奴和奴隶对人民解放军的免费医疗、谦逊作风和分发的经济物资感到既惊讶又高兴，“他们称解放军为菩萨兵，并感谢神派他们来到西藏”。

西藏和平解放后，当地盛行的喇嘛教信仰仍然得到保护，但当地僧侣群体的角色发生了变化。爱泼斯坦对此谈到，“政治上，劳动人民现在居于首位，因此他们没必要再忍受那些寄生统治者的权力淫威。僧俗剥削者的封建特权都已经被废除。披着信仰外衣的反革命活

动和其他类似活动都被取缔。但是宪法制度下僧侣们享有全部公民权，他们也承担公民的义务——忠于国家、人民和社会主义”。

“听到许多对社会主义成就的赞颂”

爱泼斯坦在书中就三次采访过程中看到的西藏在农业、工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历程进行了比较叙述，指出了中央政府对于西藏援助的重要性。

对于西藏工农业发展，爱泼斯坦举例称：“1952—1980年间，西藏的粮食产量增加了3倍多，牧区的牲畜数量增加了2.5倍，工业产值也增长了数倍，所有这些成就在旧制度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解放后西藏工业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干牛粪为主要燃料到采煤、石油钻探、地热的初步利用到使用太阳能；从手工金属制造到农业机械制造；从家庭纺织到毛织品的工厂化生产；从手工剥皮、光脚在鞣剂里踩踏到使用机器加工皮革产品；从手工造纸的一次一张到可以生产出很大纸卷的工厂造纸；从油墨木版和手推墨辊一页一页印刷宗教文献到轮转印刷机每年生产数百万种的藏语书报等等”，这些明显的进步也反映了社会生产条件的变化。

西藏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日渐丰富，爱泼斯坦以电影为例进行了阐述。他指出，“电影是最流行的艺术形式之一，但是在1951年——人民解放军到达西藏之前，西藏的大多数人还从未看过电影。到了1965年，看电影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即使在偏远的地区也是如此”。他提到：“1955年我第一次去西藏采访时，公共电影已经非常普遍。第一支放映队在前四年里一直很活跃，他们共放映了1840部影片。十年后的1965年

夏天，每座城市都有了能白天放映影片的永久性影院。”爱泼斯坦还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文化的保护政策，他认为，“在这些政策之下，几个世纪来热情勇敢的西藏人民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的伟大成就正在得到发扬和保护，尤其是建筑学、古代桥梁建筑、医药、工艺品制作、音乐、舞蹈、藏戏……现在，所有这些都属于创造它们的西藏人民”。

中央政府对西藏进行了大量支持和援助，这也是西藏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爱泼斯坦提到：“西藏自治区的行政管理开支由中央财政负担，而且头几年的拨款年均增长10%”，西藏税率低于内地的税率，且中央对通过陆路运入西藏的商品实行补贴，因此，西藏大多数商品的零售价格与原产地的价格持平。“从1959年起，国家对西藏农牧民及集体所有制企业提供低息或免息贷款，这些资金均被用于购买耕畜和各种生产工具”。与此同时，西藏的医疗卫生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爱泼斯坦指出：“从过去广大藏族人民没有任何医疗到现在所有民众基本都能得到免费诊疗，西藏医疗有了很大发展。我们听到许多对社会主义成就的赞颂。”

爱泼斯坦通过前往西藏的三次实地采访，见证了西藏突飞猛进的发展，看到了西藏走向繁荣的光明前景。他在为该书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通过所有藏族人民包括现居海外的藏族人民最大限度的团结和支持，西藏实现了健康稳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这种发展相比以前更不应该受到干扰，其发展会更更快连续。”



1999年9月17日，中央党校主管主办的《学习时报》创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是全党唯一专门讲学习的报纸。它一问世，便引起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尤其是干部教育工作者们的密切关注。时光荏苒，岁月如梭，25年筚路蓝缕，25年春华秋实。《学习时报》以权威性、理论性、知识性的办报特色，“依托于读书，着眼于问题”的准确定位，在国内众多报刊中可谓独树一帜。

《学习时报》创刊时，我还是江西省委党校的一名教研人员，2004年9月以后到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工作，一晃就是20年。我一直是《学习时报》的忠实读者，翻阅《学习时报》纸质版，或随时浏览《学习时报》公众号，已经成为一种日常习惯，甚至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从事教学科研，还是行政管理，《学习时报》始终是我理论学习的帮手，是我工作上的高参，让我受益良多。

□ 汪建新

我与《学习时报》携手前行

品读思想的力量文化的味道

观》《传承弘扬崇高革命风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等文章，深度解读了两位历史伟人的崇高追求、博大胸襟、光辉思想和丰功伟绩，既系统深刻，又高屋建瓴。

25年来，《学习时报》让我感受到纸张的质感、印刷的墨香、文字的魅力；更让我品读到思想的力量、文化的味道、学习的乐趣。渐渐地我自己也成了《学习时报》的一位热心作者。2003年11月3日，《学习时报》刊登了我的《变革学习观念，享受快乐学习》一文，这是我和它第一次牵手。我的研究兴趣是毛泽东诗词，开始

时发表的文章零零星星，受到《学习时报》风格的熏陶，我后来的稿子都成系列。2017年6月开始，我写了毛泽东诗词与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气派、中国故事一组文章。2018年，我写了毛泽东诗词与传统文化、湖湘文化、革命文化、旅游文化、审美文化等。2019年之后，我围绕毛泽东诗词中的宏观群像、春夏秋冬、花草树木、喜怒哀乐、十百千万、古往今来等写作，已经见报30余篇。这些文章主题明确，既独立成篇，又相对聚焦，形成合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时领略着研究治学、笔耕不辍的愉悦，又始终享受着与编辑顺畅交流、默契合作的温馨。每篇文章从角度取舍、框架设计，到用词推敲、标点引文核实等等，都来回讨论、反复切磋。这些文章在《学习时报》一刊出，总有一些朋友会迅速地给我反馈，能直接感受到读者的阅读热情和情感认同。这也体现了《学习时报》既能吸引读者，又能稳定作者的魅力所在。

25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学习时报》伴我一路走来，丰富了我的学识，增长了我的才干，也深化了我的研究。如今《学习时报》风华正茂，我愿意同它同心携手，继续前行、共同进步。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